

近代早期欧洲社会转型研究丛书

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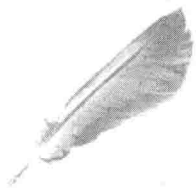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15-18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

武汉大学15-18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柴晨清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于廑学术思想研究/武汉大学 15—18 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485-7

I. ①吴… II. ①武… III. ①吴于廑—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509 号



WUYUJIN XUESHU SIXIANG YANJIU

武汉大学 15—18 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78 千字

ISBN 978-7-01-013485-7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出版说明

2013年4月，适逢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百年诞辰。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13年4月27—28日在武汉大学共同主办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单位、出版社、杂志社等60多家单位1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珞珈，共同纪念和缅怀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于廑先生。

本文集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中选编廿四篇，代表了学界对吴于廑先生卓越学术成就的赞誉和敬仰。这些文章充分肯定了吴于廑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对吴于廑先生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及其在世界史教材编纂上的实践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先生虽已远去二十载，其思想、学识和情怀却历久弥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今天，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一个“绿意渐浮”的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展吴于廑先生丰富的学术思想，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推向世界，还需我们世界史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孜孜以求！

武汉大学15—18世纪世界历史研究所
二零一四年四月

目 CONTENTS 录

- 1 / 吴于廑先生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 齐世荣
- 8 /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朱 寰
- 13 / 吴于廑先生学术思想点滴回忆 马克垚
- 17 / 解牛待有操刀手 书生留得一分狂
——缅怀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王敦书
- 23 / 吴于廑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 安长春
- 30 / 吴先生的一本小书和一封信 郭小凌
- 33 / 回望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史追求 刘北成
- 37 / 吴于廑与《世界史》
——附吴于廑的书信并忆其为审稿而逝世的经过 王方宪
- 50 / 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里程碑
——六卷本《世界史》述评 王方宪
- 57 / 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观与我的世界历史教学 徐 蓝
- 63 / 20 世纪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若干思考 胡德坤
- 75 / 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宏观理论的贡献 陈志强
- 88 / 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 刘景华
- 103 / 世界历史研究的“通观”
——吴于廑先生的学术境界 孟广林
- 118 / 论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关系
——兼谈吴于廑先生的宏观世界史研究 李增洪 陈德正

133 / 吴于廑先生与纵横发展整体化世界史观	邢来顺
137 / 吴于廑与世界历史整体研究	张一平
152 / 百年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及其相关问题辩证	于文杰
172 / 吴于廑先生对整体史观的探索与世界通史编纂实践	赵文亮
187 / 关注中西封建社会的法律因素	
——读吴于廑先生两篇学位论文有感	陈 勇
191 / 吴于廑先生与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黄 洋
203 / 吴于廑在古希腊史领域的拓荒及其启示	何元国
218 / 吴于廑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	张 洁
228 / 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观”及其研究	曹胜强 贾文言

吴于廑先生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严格说来是在1949年以后。此前，各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课程主要是西洋史（即欧美史），包括西洋通史、西洋断代史和一些欧美国家的国别史。开设东洋史（如日本史、印度史等）课程的学校很少。似乎没有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专门开设过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总之，那时还没有世界史。中学的外国史内容主要也是讲西洋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界上层崇拜欧美，以欧美为榜样，西洋史自然便占有中心地位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统治者那样只把目光集中于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还要追溯它的历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世界史学科终于一步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大专院校一般设有世界史课程，分做四大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讲授，此外还有一些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等等。中学也设置了世界史课程。从1949年到1959年，各高等院校的世界史课程大都采用苏联教材，那时把苏联史学看得很高，中国教授们即便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敢也不可能发表。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此后“言必称苏联史学”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所到达的水平，产生过

^{*}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崛起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70030）阶段性成果。

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加强了亚非拉部分的内容，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章节，比苏联教材有所改进，但整个框架仍未脱苏联教材窠臼。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改善了，学者们既敢于打破苏联世界史的框架，也敢于参考西方学者的看法了，于是人们热烈议论起世界史究竟应当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以及世界史如何编写的问题。吴于廑先生从1978年起大力投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下从4个方面试做一些介绍。

一、什么是世界史学科

吴先生给世界史下了一个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①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的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他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另一句话：“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用以说明他给世界史学科所下定义的根据。

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世界史的概念不应庞杂，它不是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一口大麻袋。“就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中一门单独的分支学科而言，它的探索目标必然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括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③实际上，要把一切国家、地区的历史都写在一起，不仅在篇幅上要无限扩大（而这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这样写出来的世界历史让读者根本无法看清楚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全貌，只能见一棵一棵的树木，而不见森林。

吴先生强调指出世界历史的宏观性。他说：“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③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划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精密研究成果，必须要理解、吸收，而且不足的还要作认真的补充研究。但是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①

二、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有些人对吴先生给世界史学科所下的定义发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他只强调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吴先生对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十分全面的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他特别指出“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吴先生的结论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②今天，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十分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人类跨文化互动的历史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他们比较忽视历史的纵向发展，是一个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了工业的扩展”。^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它（指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

①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28页。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见《自选集》，第61—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闭关自守的状态。^①这些话说明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相互作用，不应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三、世界历史的专题研究

吴先生认为，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他举例说，“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另一类是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再一类是有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曾经经历过，从世界全局对这类共同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必然有利于阐明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的潮流。^②吴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专题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自己也就若干重要专题撰写了论文，例如《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③这四篇论文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多历史运动，材料丰富，分析深刻，堪称鸿篇巨制。

四、对世界史分期的重要看法

吴先生对世界史分期有独到的见解。他反对“剑桥三史”（即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关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标志，写道：“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上古史就完了，中古史就开始了。1453年，十五世纪中叶，土耳其人打下了君士坦丁堡，西方正当文艺复兴，中古史就完了，近代史就开始了。这种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是“欧洲中心论在分期问题上的表现”。他认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按社会形态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其具体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再加一头一尾，头是原始社会，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

②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25—28页。

③ 《自选集》，第91—225页。

是1917年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①

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把古代史作为一编，而不是像过去周、吴本那样把古代史、中古史明确地各自划分为一卷。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的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②他还说，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是不妥的。除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之外，这种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总之，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雷海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写道：“就今日所已知的来讲，我们暂时可以说，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还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样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都歧异，整个的问题仍待历史学者彻底的分析研究。”^③雷、吴两位的看法有某种相同之处。

六卷本《世界史》的《近代史》编以1500年为起点。吴先生认为：“十五、十六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④有人认为，这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吴先生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立论的，并非故意夸大欧洲的作用。我们批判“欧洲中心论”，只是反对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一切，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的观点，但并不抹杀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占有的优先地位和起过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

①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19—22页。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见《自选集》，第69—70页。

③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05页。

④ 吴于廑：《世界历史》，见《自选集》，第77页。

的长河中，在一个时期里，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走在前面，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便成为“中心”。“中心”有时是一个，有时不止一个，而且“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8世纪中期以后约一百年，阿拉伯帝国臻于极盛，与此同时正值中国隋唐时代，它们在东西方各自占有“中心”的地位。19世纪是欧洲力量的鼎盛时期，西欧自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心”。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某一部门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世界的中心。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①

吴先生十分重视研究十五、十六世纪的历史，为此在武汉大学成立了一个“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并主持出版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刊载了几十篇颇有价值的论文。

* * *

总之，吴于廑先生对于建立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从理论到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发表了深刻的、有启发性的见解。当然，他所做的工作基本是开拓性的，他提出了问题，指出了方向，但要达到目的地，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这是需要后继者用几代时间去实现的。他在《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中说：“我们研究室在近两三年所做的点滴工作，仅仅是借光于他人工作的一些有关的研究，为自己探路。这所借的光，也只是我们目前所能接触到的那一星半点，微弱而又不集中，因之所探的路也就很狭窄、很有限，只是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说不上宽广，更说不上在宽广的范围里为比较重要的问题理清眉目。这本集子是一小册真正意义的初学集。”他还说：“这本初学集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开始。发表这本初学集，并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什么可以自信的结论，而是把我们的设想，把我们试图为之努力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提出来就正于读者。”^②这些话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谦虚精神，但也是实事求是的。

世界史学科目前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由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异常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

^② 《自选集》，第543—546页。

富，异常复杂，要使它成熟起来，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今天中青年学者的身上。他们未来的成就一定也应当超过前人，但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2013年2月17日写竟
谨以此小文献给吴于廑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朱 寰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日日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回想起来，吴先生的大名早为学界所景仰。20世纪50年代，我校郭守田先生在世界史的一次会议上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费派遣出国留学生，多半都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中国的哈佛大学留学生中历史学方面有‘前三杰’和‘后三杰’：20年代的前三杰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40年代的后三杰是吴于廑、杨联陞和任华。”我想，这些学术名人，只能慕名而不能谋面，实属憾事。

说也凑巧，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高校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决定组织全国力量重新编写高校教材。世界史是我国新兴学科。国家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为《世界通史》总主编，另由各大学抽调一部分编者在周、吴二位主编领导下参加编纂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这部教材中古分册的编纂工作，从而在1960—1961年间，有机会与吴于廑先生直接接触，有问题当面请教，聆听先生的亲切教诲。这两年我切身感到受益良多。

首先，我想谈谈对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解。旧中国在历史学科中没有世界史，除中国史之外，只有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或是东洋史、西洋史等地区史，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大学里根本不开设世界史课。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即新

中国成立后，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了《世界史》课。究竟什么是《世界史》？当时许多人弄不清楚。我们教《世界史》的教师都希望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在编写《世界通史》时，更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夏，《世界通史》编写组在北京饭店召集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讨论《世界史》教材大纲和教材初稿。会上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就有很大分歧：有的说：“《世界史》就是本国史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历史”；有的说：“《世界史》就是各地区史的综合，各大洲的历史加到一起，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但似乎没有反映世界史问题的本质。会后我去察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问题的基本观点。结果查到了几条，而其中有一条，感到难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马克思这句话理论深奥，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存在？而世界史又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总是想不太明白，对世界史的本质认识不清。

《世界通史》教材讨论会结束后，教材的总主编和分册主编全部迁到高级党校，进一步修订教材。大家住在一起，每人一个工作室，讨论和研究问题比较方便。于是我将存在的疑问提出，向吴先生请教。先生看过马克思原著后对我说：“历史学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是现实，到了明天这个社会现实就变成历史。有今天的现实社会才有明天的社会历史。有国家民族范围的现实社会，才有国家史和民族史。一定地区内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逐渐联系密切，从而形成地区史，如东亚史、南亚史、欧洲史等，地区是局部世界，也可以称为局部世界史。人类社会在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因为人有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生产力水平低下，相互联系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整体世界史。所以马克思这句话的上半句是说，真正的统一整体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下半句是说，作为整体世界史学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通过现代化的大生产，世界上所有民族联系加强了，才能逐步形成统一整体，成为整体世界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吴先生还提醒我，仔细看看马克思著作中这个括号内最前面的一个词组“交通工具的影响”。这就是说，世界很大，既有大陆山川，又有海洋岛屿，如果交通工具不发达，没有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船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人们无法与远方的人们进行交往和交流，自然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的历史。吴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终生难忘。

这就是说，世界史是整体世界的历史，不是局部世界的历史。整体世界有一个形成过程；世界史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各种不同地区史、专门史等，都是整体世界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希腊地区史），波里比阿的《历史》（罗马地区史），司马迁的《史记》（自称为“天下史”，实际是秦汉之际的中国地区史），朗克编的《世界通史》，威廉士编纂的《史学家的世界历史》，《剑桥三史》等等，都属于或大或小的局部世界史。没有逐步扩大的局部世界史也就不可能有整体世界史。整体世界史既不是地区史的相加，更不是国别史的堆砌，而是世界上的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整体世界。所以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整体世界历史也是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我想谈对吴先生治学态度的理解。我是在1951年夏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世界史教学工作的，当时国家尚未实行研究生制度。接触吴先生后，我想默默地视吴先生为自己的导师，既可公开请教学问，又可观摩学习其治学和为人。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两年多的耳濡目染和有心观察，我非常钦佩吴先生的治学：勤奋刻苦，严谨求实，广涉精思，一丝不苟。中国北宋大学问家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就是说，读书为立身、立学的根本。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刻苦是立身、立学的先决条件。

在《世界通史》教材编纂过程中，吴先生要求从大纲的框架结构到内容的思想观点，从资料选择到文字表述，全都要仔细推敲，精雕细刻。哪怕有一点小小的疑窦，也要去大图书馆认真核对核实。有的需要查外文书，有的需要查中文古籍，有的需要检索中外文期刊。因而我们经常跑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每次去图书馆，吴先生都不许我给他搭出租车，而是主动去乘公共汽车。其勤俭刻苦朴实的作风，可见一斑。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先写在笔记本上，进入图书馆后就争分夺秒，手不释卷。每次去图书馆大致需要两三个小时。例如，在修改中古部分阿拉伯帝国一章时，对其极盛时期的租赋收入数字产生怀疑，为此曾专门跑北大图书馆解决。为了赶进度，我们主编组从来未休过星期日和节假日。当时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蔬菜供应不足，早点常以菠菜根制成的咸菜

佐餐。晚餐开得早，夜间工作时间长，就寝时已饥肠辘辘。生活虽比较艰苦，但无人叫苦。大家总是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全身心地投在《世界通史》上。

吴先生哲学修养水平高，思维能力强，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讨论问题，抓住关键，一语中的。研究世界史也特别需要哲学思维。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各地区、各部分联系的加强主要是靠彼此间的经济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相互学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提高。吴先生有专文论述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往和交流，促进各自社会的进步。公元4—5世纪，亚欧大陆上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自东徂西，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向农耕世界进攻。于是在西欧出现了许多新型的蛮族国家。这些国家虽在希腊罗马的故地兴起，但他们并不通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字，也没有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需求。因此，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欧洲被埋没了近千年，故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在7世纪前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然后向东方和西方扩张。200年后在东方到达了中国和印度的西部边界；在西方经过西亚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直至西班牙半岛。于是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和欧洲西南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这个大帝国基本上从9世纪初起，逐渐掀起一个主要是翻译希腊（也包括少部分罗马和波斯）著作和典籍的运动，即“百年翻译运动”。希腊的哲学、文学、社会、经济、历史、天文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许多重要著述和典籍，都翻译成阿拉伯文本，并根据阿拉伯人的理解，加上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著作与文献典籍，有些在中世纪欧洲的战乱中遗失，不得不从阿拉伯文译本重新引入西方。因此，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对西欧文艺复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吴先生要查明阿拉伯人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的名字及其译著，最终在国家图书馆解决。原来四大翻译家是侯奈因·本·易斯哈格（809—877年）、阿尔·法拉比（870—951年）、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9年）、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

再次，谈谈我对吴先生的为人和为师之道的理解。我通过编写两部世界史教材（周吴本和吴齐本），与吴先生相处的机会增多。我对吴先生的认识和尊敬也与时俱进。我认为先生在为人方面是爱国家、爱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人。在待人方面是与人为善，诲人不倦，为祖国教育事业尽心竭力，无怨无悔。吴先生做人处事，都是非常谦虚谨慎，表现出一位大学者的儒雅风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吴先生对我们